

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 论文集

主 编 李范文
副主编 罗矛昆
张迎胜

宁夏人民出版社

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 会议论文集

主 编 李范文

副主编 罗矛昆

张迎胜

宁夏人民出版社

K246.3-53

责任编辑:王立平

1999. 9. 2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No. 2933071

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主 编 李范文

副主编 罗矛昆 张迎胜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0.125 字数 70 千 插页 2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ISBN 7-227-01908-X/Z·71

定 价:59.00 元

前 言

1981年8月3日至8日，由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历史学会主持召开了首届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代表70多人，提交论文40多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论文集，深为遗憾！但是，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被称为西夏研究的“里程碑”。这次会后到1995年8月，在短短14年中，发表有关西夏研究的论文、资料、通讯等数以百计，仅专著30余部，平均每年两部，其中大部分著作是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多为宁夏学者。从西夏灭亡（公元1227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共722年，有关西夏的著录仅30余种，保存下来的只有20余种，而且多为史料。这14年所出版的专著，不论从质量上或数量上说均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722年，这怎能不说是奇迹！由此可见1981年的西夏研讨会确实对西夏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从这次会后，国内外的西夏学者都希望我们宁夏召开一次国际西夏学术研讨会。宁夏的西夏学者接受大家意见，积极准备，到1993年9月条件基本成熟。因此，宁夏社会科学院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建议，由宁夏社会科学院牵头，与宁夏大学、自治区文化厅、银川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获得批准，1995年8月22日至26日在西夏故都银川市召开了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来自俄罗斯、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和我国西北、东北、华北、西南、中南、华南、华东以及台湾等地区，共计150多人，提交论文80余篇，不论代表人数或论文篇数，均比首届国内西夏研讨会增加了一倍。

大会收到的论文都是国内外西夏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质量高，内容丰富，涉及的面很广泛，有探索族源、社会制度、民族关系、外交、法律、人口、生产技术、宗教信仰、文化体育、考古发掘、文物考证、经济、货币、语言文字、人物家谱、学科关系等等。不论文章的写作技巧还是内容论证都已达到较高水平，这充分说明近年来的西夏学研究正在深入，有了新的发展！

外国人对西夏文字的研究，最早是英国人伟烈力亚（A. Wylie），他于1870年对居庸关六体碑文中的西夏文进行了研究，误认为是“女真小字”。尽管1895年法国蓬拿帕特（P. R. Boanparte）、沙畹（M. E. Chavannes）怀疑伟氏观点，但直到1898年德维利亚（Mr. Devieria）明确考定出凉州

感应塔为西夏文。这要比张澍的考定晚了半个多世纪。

对西夏文字进行科学分析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公元1909年，俄国地理学会派柯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来我国探险，在内蒙古黑水城发掘出大批西夏文献，其中有汉夏、夏汉对音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它成为打开西夏文献的“金钥匙”。

随着对《掌中珠》残页的公布研究，揭开了神秘的西夏文字之谜。出现了一批西夏学专家学者。例如俄国的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聂斯克（Н. А. Невский）、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法国的德维利亚（M. Devéria）、毛利瑟（M. G. Morisse）、沙畹（M. Ed. Chavannes），英国的布谢尔（T. W. Bushell）、德国的本汉底夫人（A. Bernhardi）和查哈（Mr. zach），美国的劳佛尔（B. Laufer），日本的石滨纯太郎等。在我国出现了罗福成、罗福苾、王静如等一批西夏学专家。还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例如北平图书馆出版的《西夏文专号》；王静如的《西夏研究》1-3辑，使他获得法国东方茹莲奖。苏联聂斯克雄心勃勃，计划刊布黑城出土文献，他说：“刊布柯兹洛夫所获文献，乃是具有头等国际意义的科学事业。”正当这一学科蓬勃发展、聂氏为出版这批文献而奔波时，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欧洲，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由于肃反扩大化，杰出的西夏学奠基者聂斯克于1938年死于冤狱，年仅46岁（1892年—1938年）。

从此西夏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直到60年代这一学科开始复苏，特别是1960年，前苏联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把他的论文及备用的字典手稿，影印出版，名曰《西夏语文学》，1962年获列宁文学奖金。从此，这一学科在前苏联得到重视，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苏敏（М. В. Софронов）（又名索夫罗诺夫）、克平（К. В. Кепинг）等一批西夏学专家。在日本出现了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在法国出现了石泰安（R. A. Stein），在英国出现了格林斯坦德（E. D. Grinstead），在德国出现了傅海博（H. Franke）等一批著名学者。

在我国，西夏学起步较晚，60年代培养人才，却又遇着“十年浩劫”，70年开始出成果，80年代出版了一批较有分量的专著，例如《文海研究》、《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西夏史稿》、《党项西夏资料汇编》、《西夏文物研究》等，香港林旅芝的《西夏史》，台湾龚煌城对西夏语言文字颇有研究，深邃的思考，独到的见解，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在国内外西夏学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召开了这次大会，从给大会提交论文之踊跃可以看出。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论文都收

入《文集》。未收入的论文，有的水平较高，专业性很强，但我们一时难以翻译，例如克恰诺夫的《论西夏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苏敏的《西夏语音韵问题》、克平的《西夏人对“白高”的解释》等。有的论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文笔生动，但比较长，达四五万言，有的更长，不便删节，例如林英津的《木雅人与木雅语》，余苇青的《金元时期的卫生形势与人口丢失》等。有的论文，已在其它刊物发表，亦不再入选。总之，选入者不见得每篇比未选入的好，未选入的不见得差。我们计划向《宁夏社会科学》、《宁夏大学学报》推荐。我们相信“真金不怕火炼”，只要内容好，是好文章，到处都会受到欢迎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这本文集，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景永时同志与作者联系，组稿方面出力不小；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所长王天顺同志也为《文集》出了力。特别是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吴宣文，副总编王文庆，政史室主任马洪真、副主任汤晓芳等同志予以热情支持，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者

1995年11月18日

目 录

李范文：再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	1
张 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	24
韩荫晟：麟府州折氏述论	35
(俄) K. B. 克平：西夏国名新论	50
乔幼梅：西夏兵制初探	56
杨树森：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历史发展之管见—— 兼说辽夏金时期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	65
周伟洲：五代至宋陕北的党项及宋夏在陕北的争夺战	70
王民信：王安石与西夏	86
舒 焚、陈世昭：三人相继而行——李元昊与赵匡胤以及耶律亿	100
朱子方：论辽兴宗对西夏用兵	110
金渭显：西夏与宋辽之关系 (986 - 1048)	119
刘兴全：夏宋通使制度考述	139
蔡东洲：论南宋同西夏的关系	150
丁柏传：试论西夏与北宋的经贸往来及其影响	158
(法) 单泰陆：成吉思汗五次征服唐兀国的自然条件	165
刘玉叔：略论沙州回鹘与西夏	168
白 滨、史金波：黑水城的发现与俄藏西夏遗书	178
罗矛昆：《圣立义海》与西夏人的哲学思想	188
李 温：《西夏法典》——研究西夏史的珍贵资料	195
陈炳应：《天盛鼎新律令·物离库门》译释	201
胡若飞：《西夏法典》“比附律”考要	210
陈庆英：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	221
李 虎：西夏人口问题琐谈	230
余苇青：试论西夏人口消失的原因	237
杜建录：西夏农田水利的开发与管理	242
李华瑞：西夏酿酒业初探	249
王克孝：西夏王朝对我国书籍生产和印刷术的突出贡献	258
苏冠文：西夏力学史略	266
王福良：西夏化学成就综述	271

张迎胜：刍议西夏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277
张建华：西夏文学概论·····	284
唐嘉弘：论西夏人的宗教信仰·····	292
史金波：西夏的佛教制度·····	301
陈悦新：西夏——元的藏传佛教绘画·····	316
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普至合口本续》是西夏印本辨证·····	323
陈广思：西夏党项族婚俗探析·····	330
尚世东：党项盟誓探析·····	338
雷润泽：西夏文物古迹保护与研究·····	344
韩小忙：西夏陵陪葬墓述略·····	347
吴峰云：论银川出土鎏金铜造像的年代问题·····	355
孙昌盛：释寺沟方塔始建年代考·····	359
马雅伦、郑炳林：西夏文《相面图》研究·····	366
杜玉冰：西夏北部边防与古城·····	374
王 勇：西夏货币研究琐议·····	381
西田龙雄：西夏文字的特性和西夏语的声调变化——西夏文字新考·····	386
黄布凡：西夏语表“一”数词·····	393
马忠建：西夏语的否定附加成分与否定形式之研究·····	401
陈 康：西夏语鼻冠音谏议·····	421
林英津：木雅语资料：狮子与兔子的故事·····	431
陈宗祥：西夏语与南语比较研究·····	444
李培业：西夏皇族后裔考——《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之一·····	455
刘凤翥：罗福成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	463
王天顺：略说西夏学的相关学科·····	470

再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

宁夏社会科学院 李范文

1955年,唐嘉弘先生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一文^①。1980年,我在《民族史论丛》上发表了《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一文^②,对唐先生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西夏党项拓跋氏是鲜卑族,我认为是党项羌。1989年,他在《中国民族史研究》(2)上又发表了《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③,认为我“忽视了正本清源的工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1986年汤开建同志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④一文,1992年李志清先生在《西夏文史论丛》(一)上发表了《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族源探索》^⑤一文,都对我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西夏拓跋氏是党项羌,而不是鲜卑族,这一观点并不是我的创造发明,早在1956年,杨志玖先生在《西夏是不是羌族》^⑥一文里已提出这一观点,1988年著名吐谷浑、党项史专家周伟洲教授在《唐代党项》一书^⑦里,对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族源作了详尽论述,然而唐、李、汤三位先生的观点以及他们对资料的错误理解,的确需要“正本清源”,特别是李志清先生的文章,洋洋四万言,“怪论”颇多,由于篇幅限制,恕我不能一一评说,择其要者略陈管见。

一、关于西夏党项族的来源问题

关于西夏党项族的来源问题,本来是无可争辩的问题,新旧《唐书》讲得清清楚楚

①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2期。

② 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辑《民族史论丛》,1980年。

③ 唐嘉弘:《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④ 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⑤ 李志清:《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其族源探索》,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⑥ 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很遗憾,我写《试论》时,并未见此文,至今尚未找出此文,此处转引自汤开建同志的论文《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中国民族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⑦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

楚：“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①即使《宋史》所载，亦与《唐书》无别，其书云：“党项，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后周世始强盛，有细风氏（《唐书》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乱氏（按：乱误也，《唐书》为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旧唐书》为米擒氏）、拓跋氏最为强。……今灵、夏、绥、麟、府、环、庆、丰州、镇戎、天德、振武军并其族帐。”^②不论新旧《唐书》或《宋史》，都讲得一清二楚，为何史学界产生如此激烈的争论？这与元昊称帝时为自己出身找一个皇族高攀一番，为他当皇帝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有关。为此《宋史》出现了元昊谋僚为他精心炮制的奏表：“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③依此《辽史》、《金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以后出现的有关西夏史籍，无不沿其说，加以附会。因此，确实需要“正本清源”。

（一）关于“党项羌”与“羌”的问题

唐嘉弘同志说：“所谓‘党项羌’族究竟是一个单一民族，还是一群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不同共同体的泛称？‘党项’和‘羌’是两族或一族，他们是泛称或专称？即他们究竟指的是不同共同体的专名，还是仅仅指的是具有特殊习俗的大系统或广泛群体？由于李范文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自然对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论断。”^④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般民族史学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问题，党项是一个专有名词，有时指族，有时指人，但是它是羌族的一支，有时称党项羌，有时称党项族，党项羌不等于羌族，但它又属于羌这个广义的民族范畴。

羌族，是西戎诸族中最大的一个民族^⑤。他们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史称西戎，又称西羌。春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分布在今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说文·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从人，因以为号。”^⑥羌字在甲骨文里共有 21 种写法^⑦，有从羊从人者，亦有从火者，以绳缚之者亦有之。对此，罗振玉认为是羌人以绳索缚羊^⑧。顾颉刚认为商代俘虏

① 《旧唐书·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

② 《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党项传》。

③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夏国传》上。

④ 唐嘉弘：《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页。

⑤ 这里的“族”，不是指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而是泛指历史上的共同体，有时指氏族，有时指部落或部族，有时指民族。

⑥ 见《四部丛刊》初编及《太平御览》卷十九。

⑦ 徐中舒主编：《甲骨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6—417页。

⑧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1914年，由王国维手写，石印本一册。1927年东方学会石印本增订为三卷二册。

羌人甚多，祭祀时每把他们作为牺牲，作为奴隶^①。董作宾认为这是羌人头上系绳索表示羈縻之意^②。徐中舒说：殷代羌与商为敌国，故卜辞中多有伐羌、逐羌、获羌等记载，且每用羌为人牲，以贡祭祀。“是为人牲惨况之实录”^③。既然羌人遭到如此残酷的征伐杀戮，今天是否还有幸存者？他们迁入内地后，与其他民族融合，其中绝大部分融合在华夏族——汉族中了^④，只有居住在深山幽谷与世隔绝，过着世外桃源生活的人，方能保留下来，然而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殷商时的羌人。四川汶茂的羌族，虽然名称与古代的羌完全相同，但他们只是古代羌人之一支——冉駹羌，而非甲骨文上的羌。即使甲骨文中的羌，也绝非单一的民族，只是殷人对他们的记载而已。我想这样回答不知可否？我只是希望嘉弘同志不要在名称上考究，究竟是单一民族，还是群体？是党项羌，还是羌？我们讨论问题的核心是党项羌是否是鲜卑族的问题。

任何发达的民族没有纯血统的民族，党项族是这样，华夏族也是这样。如果把部分其他民族，包括吐谷浑——鲜卑族人融合于党项族，这是完全可能的，正如羌人融合于汉族一样，他们并未同化汉人，使汉人变为羌人，汉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经济生活……都没有变，仍然是汉族固有的，你能说汉族变成了羌族？党项羌中也可能吸收了一部分鲜卑族，然而鲜卑族并未同化党项族，党项族的民族特征依然存在，史书上承认他们，并有他们的语言、文字和历史，你怎能否定呢？如果把其他民族融合于党项族，诬称他们是“杂虏”、“杂种”、“杂人”^⑤，那么，汉族的情况比党项族的情况更为复杂，早在春秋战国时，中原的华夏族与戎狄已经杂居，范文澜说：“东周天子的都城洛阳，附近就有陆浑之戎、伊洛之戎。卫国城墙上可以望见戎州。在春秋时期，华夏族与非华夏族斗争非常激烈，到战国时期这些民族大体上都与华夏族融合了，形成一个华夏族。”^⑥按照汤开建的观点：华夏族同党项族一样：即“杂虏”、“杂种”、“杂人”之义，这不是等于自己骂自己？何况华夏族创造的古老文化成为其他兄弟民族学习向往的乐园，各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西夏仁宗“慕大汉休风，特起太学，亲临释奠”^⑦。今天的民族史学工作者不应同历史上的大汉族主义者一样沿用对少数民族的诬称，这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利于民族团结。

党项羌同汉族一样，是由各种不同的部落融合发展起来的一个共同体，以她为主体建立的西夏王朝，已载入史册。唐嘉弘同志为了证明党项羌不是羌族一支，而是鲜卑族，找出一个不值一驳的“证据”。他说：“王昭君按和亲政策嫁给匈奴后，实行匈奴‘父死妻后母’的习俗，又嫁给庶子复株累单于，‘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李奇注：‘居次者，女之号，若汉言公主也。’可见居次为一通称，长女嫁

① 顾颉刚：《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② 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载《说文月刊》三卷七期。

③ 徐中舒主编：《甲骨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页。

④ 李范文：《先秦羌戎融华考》，《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⑤ 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32页。

⑥ 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和融合》，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⑦ 《西夏书事》卷三十六。

给须卜氏的男子，故称须卜居次；次女嫁给当于氏的男子，故称当于居次。过去一些研究北方民族史的学者，认为‘须卜’就是‘鲜卑’，‘当于’就是‘党项’，无论从音韵学或历史背景考察，均有根据，堪称卓识。^①这条极为重要的资料唐嘉弘同志并未注明出处。查《前汉书·匈奴传》，知他把重要的注释省去了，为此，兹将原文录此：“李奇曰：‘居次者女之号，若汉言公主也’。文颖曰：‘须卜氏匈奴贵族也’。小女为当于居次。文颖曰：‘当于亦匈奴大族也’。师古曰：‘须卜、当于皆其夫家氏族。’”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须卜”就是“鲜卑”，“当于”就是“党项”，而是匈奴“贵族”和“大族”。王昭君于公元前33年与匈奴呼韩邪单于成亲，而党项一名最早出现于隋代（公元581年—618年），在时间上跨越六百多年，党项怎会出现在西汉？如此引文，怎能算得上“无论从音韵学或历史背景考察，均有根据，堪称卓识”？怎能不说“产生曲解，扞格难通！”

（二）关于“羊种”与“猕猴种”问题

唐嘉弘同志说：“如果说一些羌人确属羊种，当然和党项等猕猴种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共同体了。”“唐宋时代不少历史学家清楚地把党项和羌别而为二，并未把二者混同起来，没有把二者作为一个族属看待，如《通典》卷一八七就有‘党项及诸羌’的记载。”^②

唐氏引文出自《通典·附国》，原文为：“附国……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党项及诸羌。”这里党项后虽无羌字，只是为了文字简练而省去“羌”字。诸羌者即宕昌、邓至、白兰等羌，或曰“宕昌羌”、“邓至羌”、“白兰羌”、“唐项羌”是也。“党项羌，居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别）种，其种有宕昌、白兰皆自称猕猴种。”^③《文献通考》亦然^④。至于《旧唐书》、《新唐书》、《宋史》、《五代史》、《册府元龟》等，无一不把党项称党项羌，白兰、宕昌、邓至称白兰羌、宕昌羌、邓至羌。有时为了措词简练省去“羌”字，直称党项、白兰、宕昌、邓至，但从作者安排上，他们被视为同一族系——羌系，而非他系。

至于“猕猴种”与“羊种”问题，嘉弘同志并未说明哪些族属于“羊种”，哪些属于“猕猴种”，对于“羊种”他仅仅是一种假设，“如果说一些羌人确属‘羊种’，当然和党项等‘猕猴种’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共同体了”。

猕猴种和羌，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祖先传说，后者是对其民族的族属问题所下的定义，属于民族识别问题。至于“羊”种，我们还未听说哪个民族说他们是“羊”

① 唐嘉弘：《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② 唐嘉弘：《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③ （宋）郑樵：《通志》卷一百九十五。

④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四。

种，可能是嘉弘同志为了自圆其说而假设的“名称”。

嘉弘同志说：“宋太宗曾经询问李继捧：‘尔在夏州能制蕃部乎？’继捧答复‘诸族狡恶不可制，臣但羁縻而已。’这些狡恶的诸族，就有宕族在内。西夏崇宗时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释文里说：‘先后（西夏惠宗）之朝，羌人寇边’……无论西夏党项贵族或汉族官员，当时把西夏党项和羌人加以区分。^①”嘉弘同志引用以上两条资料，不加区分来证明西夏党项和羌人是两种民族。实际上第一条资料中的“诸族”即羌的泛称。唐氏未注出处，《宋史·夏国传》载：太宗“谓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很明显这里的羌人即诸部，包括党项、吐蕃、鞑靼等人。至于《感应塔碑》中的羌人，西夏文为𐵇，据西夏人撰的《文海》解释：“羌者羌戎也，吐蕃也，蕃国人之谓也。”^②西夏文的羌，既泛指羌戎，也专指吐蕃。实际上是藏文 འབྲུག་ (bod) 之借词。对历史上的羌人、羌族，必须根据他出现的具体环境分析他究属何族，是泛指游牧部落，还是指西部各民族？是指吐蕃，还是指党项部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强人就我，贻误他人。

（三）关于《元和姓纂》与“东北蕃”问题

唐嘉弘同志说：“唐代林宝《元和姓纂》是董理古代族姓的名著，把西夏党项拓跋氏的先祖订为‘东北蕃’，并没有把他们定为‘西羌’。宋人王称（偁）在其《东都事略》中《折可适传》记折氏先祖‘与道武俱起云中，号代北蕃姓’。……戴锡章《西夏纪》中认为‘西夏本鲜卑别种，故其国人有鲜卑氏’。《金史·西夏传赞》：‘……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一系列的有关史料均说明西夏党项拓跋氏属于鲜卑族群，而非所谓羌族。”^③

这里有四个问题需要回答：（1）关于《元和姓纂》中的东北蕃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唐先生提出，汤开建同志也提出这个问题^④。陈炳应、周伟洲教授对此作了十分令人心服的答覆^⑤。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卷一“拓跋”条，他们认为，将元魏拓跋氏的谱系直接与党项拓跋氏联系在一起，并且称“党项拓跋氏”为“东北蕃”。这条资料出自唐代，时间较早，而且是汉族所纂的姓氏著作，自然有它的权威性。但是陈炳应同志说：“第一，据《元和姓纂校勘记》的考证，此书早已亡佚，是孙季逵从《永乐大典》和其它文献中钩沉补辑的。而且林宝成书过于匆忙，孙季逵的校录时间更为紧迫，所以书中错误很多。第二，说到西夏族源问题，最早的史籍都说党项是羌族，并未提到有鲜

① 唐嘉弘：《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② 史金波等：《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海33.141。

③ 唐嘉弘：《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03页。

④ 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26页。

⑤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155页。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卑族混入。”“第三，‘拓跋’之名并非鲜卑族所独有。在唐代初期，今西藏地区就居住着自称‘达布’的少数民族。今甘肃、四川交界处居住着一个尚未正式识别族属的民族，他们自称‘达布’、‘夺簸’。”而《姓纂》及《宋史·宋琪传》称内迁至夏州的平夏部党项拓跋氏为‘东北蕃’或蕃姓，是因他们内迁至河套南，故云‘东北蕃’或‘蕃’，决非专指鲜卑而言，因为到唐代所谓鲜卑早已融合于汉族或其它少数民族中”唐宋时期，“蕃”不过是内地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而且主要指西北的羌（包括党项）、吐蕃等。

(2) 关于折氏的族属问题，中国许多史籍及国内有关论著，大多说折氏起源于党项羌^①。其实折氏并非党项羌，正如唐嘉弘同志所说：《东都事略》中的《折可适传》，《全唐文》卷九九三，《金石萃编》中的《刺史折嗣祚碑》，以及1979年新出土的陕西府谷的《折克行神道碑》等均言“云中人也”，“大魏之后，宇文之别绪”。^②显然，这些资料是可信的。但不能以此来证明西夏党项拓跋氏亦属鲜卑族。

(3) 戴锡章的《西夏纪》所云：“西夏本鲜卑别种，故其国人有鲜卑氏。”戴氏据《宋史·夏国传》元昊称帝陈表而来，不值一驳。

(4) 《金史·西夏传赞》：“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序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这条资料，我在《试论》里已指出，皆出自元昊陈表，附会而已。

(四) 关于党项折氏与吐蕃赞普问题

唐嘉弘同志说：“党项大姓折氏，实为吐蕃赞普的音转演化。宋琪指出党项人和吐蕃人的风俗相同类似，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他们本有族源关系，是同源异流的事物。”又说：“《册府元龟》和《新唐书·吐蕃传》都记了吐蕃和党项人有相似的帐幕制，吐蕃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鲜卑人也是行用帐幕，食肉饮酪，以毛褐为衣。《旧唐书·吐谷浑传》记鲜卑吐谷浑：‘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肉酪为粮……’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习俗相同，都与羌族有别”。其结论：“西夏党项拓跋氏并非羌人，而应属于鲜卑族系。”^③言外之意，吐蕃也属鲜卑族系。

我为什么这样不厌其烦地引用唐氏原文？我生怕断章取义曲解唐先生的原意。我认为把生活习惯相同的不同民族，统统划归为一个“族系”，这是十分错误的，吐蕃本来属于羌系一支，世所公认，嘉弘同志在此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亦系“鲜卑族系”，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首先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党项大姓折氏，实为吐蕃赞普的音转演化。”我们看一看唐宋时的折氏是否赞普的音转演化。

① 《旧唐书·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八；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等。

② 《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页注。

③ 《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页注。

折：禅薛山开三入，音 zīet。(即折禅声、薛韵、山摄、开口、三等、入声)。另一注音为：折：章薛山开三入 音 tsīet。声母不是禅母 (z)，而是章母 (ts)。

氏：禅纸止开三上 音^ozie

赞：精翰山开一去 音 tsan^o

普：滂姥遇合一上 音^ophu

折氏 zīet。^ozie

赞普 tsan phu

从音韵上分析：“折氏”其声母均为禅母 (z)，“赞普”，其声母一为精母 (ts)，一为滂母 (ph)。二者无任何联系。这怎能说“折氏”，“实为吐蕃赞普的音转演化”？从词义上分析，折氏乃云中鲜卑姓氏，赞普、藏文为 btsan - bo，别作赞府、赞逋，意为王。敦煌发现一份汉藏字书中，释为“天子”。^①《新唐书·吐蕃传》释为“君长”，“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不论从语音分析或词义诠释上，二者毫无共同之处，怎能说是同一音转演化？

如果单从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相同或相近，就得出同一“族系”，这实在太轻率了。论其证言，党项羌和吐蕃，他们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党项语——西夏语属彝彝语支^②还是羌语支，尚在争论之中^③。而藏语则为藏缅语族中的藏语支，这是公认的。鲜卑语属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有三个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鲜卑语属哪个语族尚无定语。有同志见到《河西夷语》，不分析这个“河西夷语”是蒙古语、吐谷浑语，见有“唐兀惕”就得出是“党项语”。于是得出“《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语属阿尔泰语系，非藏缅语系（族），西夏国书是音符文字，而非如一般专家学者们所认为的出自‘六书’或汉字构造方式”^④。他同唐嘉弘先生一样，对语音学缺乏了解，致使得出十分错误的结论，使人感到遗憾。

(五) 驳“党项”即“大夏”说

我在《西夏国名辨》一文中说：“据考证，大夏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夏’，注：‘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主其德能大中国也。西晋时匈奴酋长赫连勃勃……公元 407 年自称大夏天王。……疑元昊取大夏之名是赫连勃勃之大夏。赫连勃勃称天王，元昊也称天王（漠宁）、天大王（漠宁令）等……但从‘大白上国’一名的来历，知西夏人崇拜他们的祖先发源地‘白上’（即白河上游地区）来命名自己的祖国，因此疑大夏是由大夏河之名而来”^⑤。从现在看来，除了“大白上国”有新发现的资料

① 《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22 页注。

② 美国学者劳弗尔 (B. Laufer) 认为西夏语属于彝彝语支，提出西 (Si) — 罗 (Lo) — 么 (Mo) 这一著名论断，被认为是研究西夏语的“指南针”（见《西夏文专号》、《西夏语研究小史》注 11）。

③ 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④ 魏英邦：《西夏民族的祖先是党项抑是拓跋？——一个民族历史问题的探讨》，《甘肃民族研究》1984 年第 1—2 期 第 31 页。

⑤ 载《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应改为“大白高国”^①外，我认为我的观点无可非议。迄今为止，在西夏人自己的文献里，尚未见对“大夏”有任何解释。至于汉族学者各叙己见，这是学术繁荣昌盛的表现。李志清先生则认为我“博采众说，集诸异论之大成，但无所指，皆似是而非。题曰《国名辨》显然治丝益芬（引者按：芬误也，应改为棼），使欲知者无所适从。”^②

李氏可谓博览群书，使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他从我国第一个朝代夏朝开始，引《书·召诰》，导出“先民为夏”，从《书》和《诗》中，找出“禹”来，再从《国语·郑语》里发现“夏禹”；再从《史记·夏本纪》、《正义》里，方知“夏者”“国号”也。再从《帝王记》得知“禹为夏之始王”。又引《书》、《大禹谟》、《史记·殷本纪》、《左传》、《春秋经传释音》、《书记律历志》找出“唐”、“唐诰”、“唐人”。又引《史记·夏本纪》找出“太康”，《楚辞》：“夏康”。《世本》：“杜康造酒”。再引《左传》，找出“唐杜氏”。再从《经曲释文》里得出“大”与“杜”“古声相近”……再引《韵府群玉》得出“党项之党”亦当为大之音读陀、杜、都等对音通假”。如此考证，只能说是故弄玄虚，以示自己博学而已。虽然引了一大堆书来证明“党亦当为大之音读陀、杜、都等”，“党项”之正字应为“大夏”也^③。“党”是否是“大”？

党：端荡宕开一上 音`taŋ

大：定个果开一去 音 da`

陀：定歌果开一平 音. da

杜：定姥遇合一上 音`du

都：端模遇合一平 音. tu

古音党为清声母，为端母，大为浊声，为定母，它们怎能相等？“大”、“陀”、“杜”古音声母相同，均为定母，但“都”却为清声母。如此引文，无非证明党大，实际上党不等于大，党项不等于大夏，如此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这怎能不说“治丝益棼”？

（六）驳“唐古（特）”即“大夏（国）”说

如果说西夏灭亡后，外国人称西夏为唐古特、唐兀惕等，亦即唐古特等于西夏，这是毫无问题的，而李志清则说：“以‘唐古’与‘党项’之唐、党所表之音义相同，惟古与项相异，依据‘夏屋山’又作‘贾屋山’（《史记·赵世家》）’……”以此来证明：“前已述证，唐古即‘大夏之称’”^④。

唐古特是党项一名之译音，但绝不是大夏国之译音，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唐古特指

① Л. П. Н. МЕНЬШИН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МОСКВА 1984 РИС. 21、22。

② 李志清：《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其族源探索》，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③ 李志清：《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其族源探索》，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175页。

④ 李志清：《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其族源探索》，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177页。

党项族，大夏指西夏政权，西夏灭亡后，外国学者不了解，沿用唐古特（tangut）来称西夏，这无可非议，而李志清却别出心裁，把唐古与大夏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

唐：定唐宕开一平 音 daŋ

大：定个果开一去 音 da°

古：见姥遇合一上 音°ku

夏：匣马假开二上 音°ya

“唐”、“大”古音声母虽然相同，而韵母差距很大，“古”与“夏”，一为见母（k），一为匣母（ɣ），二者不是一个发音部位，匣演变为 x、g 二音，而不是 k 音。历史上很多史学家因不懂音韵学，望文生义，随便用一些汉字想当然地记录下其他民族的语音，致使以讹传讹。李志清先生正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怎能求得正确的解决？

李志清说：“西夏语自称邦泥定国（《宋史·夏国传上》），以西夏文𐵄𐵇𐵓——译音‘庞喻领’，汉意为‘白上国’，以此，所谓‘邦泥定国’这‘国’字应是一衍字，‘邦泥定’应是庞喻领之同义词异译，以义即白上国之称，则表明领或定之对义词即‘国’，据此，唐古特之‘特’应是邦泥定之同义词译别字。按以通假音定或特为国义，早见于《国语·周语上》‘邦内甸服’。……据此所谓‘唐古特’，即‘大夏国’之谓。”^①。

西夏语有文字记载是公元 1036 年以后的事，而周语即周朝语，约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771 年（西周），如按《国语》特定的周语，起自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 990 年），终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 453 年）。在时间上相距两千多年，当时还无党项族，更无西夏，这哪里是在“考证”，而是在做文字游戏。至于“邦泥定国”的西夏文并非“𐵄𐵇𐵓”，而是“𐵄𐵇𐵓𐵇”，正确的翻译应为“大白高国”，西夏人或《宋史》作者把“大白高”音译，“国”则义译，于是出现“邦泥定国”。李氏不懂西夏文，误认为“国”字是一衍字。“邦”本为“白”（𐵄）的译音，又译为“庞”。“定”并非“国”义，而是“大”𐵇的音译。此字在西夏人著的《同音》里，凡两见，一为三品舌头音上声第 14 韵，俄国学者索夫洛诺夫（М. В. Софронов）拟为 tha 2. 14^②，日本西田龙雄拟为 thaŋ^③，《同音研究》拟为 tha^④。此字早期译音为“定”。一为九品来日音，上声 54 韵，索氏拟为 lie^⑤，西田拟为 le^⑥，《同音研究》拟为 lie^⑦，《掌中珠》

① 李志清：《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其族源探索》，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76—177 页。

②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68 ИНДЕКС 0972, 0971, 1594。

③ 西田龙雄：《西夏语の研究》Ⅱ，座右宝刊行会刊行 1966 年第 504 页，第 351 页。

④ 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8 页，第 451 页，第 447 页。

⑤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68 ИНДЕКС 0972, 0971, 1594。

⑥ 西田龙雄：《西夏语の研究》Ⅱ，座右宝刊行会刊行，1966 年第 504 页，第 351 页。

⑦ 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8 页，第 451 页，第 447 页。